

社会学想象力的空间拓展

——哈维的后现代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启示

刘翠霞

(南通大学 管理学院, 江苏 南通 226019)

摘要:哈维的后现代性新马克思主义将地理学的空间范畴整合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运用时空压缩、时空修复等概念,围绕空间与资本的关系衍变对资本主义的当代发展状况进行了诊断,并结合城市空间实践的研究,分析了不平衡的地理发展的必然性及其后果。他在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冲突论”渊源之外增设了一条新的“空间”逻辑链条,将社会学与地理学关联起来,既拓展了米尔斯提出的“社会学想象力”的空间,也将社会学的想象力从历时的、以个人与社会一体化为中心的视角延展至被忽略的“空间”领域,为理解近些年来社会学理论的空间转向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具体分析范本。

关键词:社会学的想象力;空间转向;新马克思主义;哈维

中图分类号:B712.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359(2015)06-0127-07

在社会学领域,大多数学者都会把马克思作为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将之视为批判主义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开创者,强调其思想对冲突论的重要影响^①。但当西方一些学者面临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在修正和重构的基础上继承马克思的衣钵,以新马克思主义的姿态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剖解批判之时,社会学似乎并没有像对待孔德、涂尔干、韦伯等的后继者那样,对马克思的继承者们做出应有的积极的回应。在马克思之后,新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有何影响或启示?社会学能否主动从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中汲取到推动学科前行的营养?哈维的后现代性新马克思主义将地理学的空间范畴整合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在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冲突论”渊源之外增设了一条新的“空

间”逻辑链条,从而将社会学与地理学关联起来,既拓展了作为社会批判理论重要代表人物的米尔斯提出的“社会学想象力”^[1]的空间,也将社会学的想象力从历时的、以个人与社会一体化为中心的视角延展至被忽略的“空间”领域,为理解近些年来社会学理论的空间转向提供了具体的分析范本。

一、从实证主义地理学到历史-地理唯物主义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 1935-)被誉为当代西

^① 比如,《美国大百科全书》把孔德与马克思并列为“理论社会学的两大鼻祖”,其中孔德开创的是一种保守的、独裁的传统,而马克思开创的则是一种激进的、解放的传统。

收稿日期:2015-06-10

作者简介:刘翠霞(1979-)女,山东招远人,南通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3CSH002);南通大学人文社科百名科研人员培养工程资助项目;南通大学创新人才基金资助项目

方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学家、新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家,他将地理学的视角引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中,运用“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框架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及危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批判。尽管他出道于地理学,所获得的诸多学术荣誉奖励也都与此学科有关,但由于他的理论中融合了诸多人文社会学科的知识,其思想的影响已远远超出地理学界,成为人文学科领域学术著作被引用次数最多的20位在世者之一。从1969年开始,哈维发表出版了大量论著,包括《地理学中的解释》(1969)、《社会正义与城市》(1973)、《资本的局限》(1982)、《资本的城市化》(1985)、《后现代的状况》(1990)、《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1996)、《希望的空间》(2000)、《资本的空间:走向批判性地理学》(2001)、《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2003)、《新帝国主义》(2003)、《新自由化的空间》(2005)、《全球资本主义的空间:不均衡地理发展理论》(2006)、《世界大同主义与自由地理学》(2009)、《资本之谜》(2010)、《反叛城市:从城市权到城市革命》(2012)等。虽然这些著述涉及多个主题,广泛分布于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但“空间”却一直都是哈维倾注全力思索和阐发的核心问题。围绕资本与空间的关联,他“提出了一条通往后现代世界的马克思主义途径”^{[12]237},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多种可能性和当代价值,也因此为社会学的“冲突论”传统注入了一种新的解读可能,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视角,从而为社会学想象力空间的拓展指明了一条极具启发意义的思路。

作为一位以思想见长的杰出地理学家,面对当时地理学界掀起的一场以计量技术和数量模型为主要特征的重大革命,哈维意识到其中的方法论的缺失,他秉持着“方法论与哲学必须兼顾”的信念,运用当时科学哲学界极为流行的逻辑实证主义,对散漫的区位学派地理学进行了方法论的革命,以价值中立思想再造了地理学的研究伦理。由此哈维成为第一位对实证主义地理学作出系统总结的学者,其《地理学中的解释》也因而被誉为新地理学的“圣经”。但20世纪60年代盛行于美国的反文化运动使身处其中的哈维开始反思自己的学术研究。正当哈维还在为自己对社会变革的无动于衷而感到羞愧之时,他遇到了一群热衷于阅读马克思《资本论》的青年学生和教师,并加入了他们的读书小组,开始了与马克思主义的“不解之缘”。“在整个1970年代,哈维细读了

马克思的大量著作,焦点大多集中在晚期的政治经济学著作”^[13],正是在此基础上,哈维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对主导1960年代晚期的城市化、环境和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全新的解释,形成了空间-社会统一体的思想,发现了地理学与社会实践的关联,强调“空间形式并不是它所处并展现它的社会过程中的非人化客体,而是内蕴于社会过程,而且社会过程同样也是空间形式”^{[14]303}。由此他深入阐释了城市空间和社会正义之间的关系,这也成为哈维转向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标志。

随着对马克思著作研读的深入,哈维开始不断地将马克思主义与地理学结合起来展开他的理论创新。他注意到,当时“地理学家很少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成可能的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传统也极少关注地理问题”^[15]。于是他独具匠心地将两者有机地整合到一起,提出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宣言,倡导要“建立一种摆脱偏见而反映现实矛盾的地理学,它应该基于民主和人民的普遍利益,而不务强权阶层的特殊利益;接受科学诚实和非中立性的双重方法论原则,将地理敏感性整合进源于历史唯物主义传统的一般社会理论,并制定一个以历史-地理术语看待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政治计划”^[16]。也就是说,哈维认为,一方面地理学中常使用的概念诸如空间、位置、时间、环境等是构成世界的基本要素,因而历史唯物主义要理解世界必须升格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另一方面,地理学的知识论框架必须引入历史经验和历史想象,必须回归对于持续变迁的社会需求和时代境遇的关注。在他看来,“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是一种无限制的辩证的探究方法,而不是一种封闭的和固定的理解实体。元理论并不是对总体真理的一种陈述,而是与历史和地理真理达成协议的一种努力,那些真理在总体上和现阶段赋予了资本主义以特征”^{[17]441}。由此,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成为哈维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点,为他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提供了方法论的根基框架。

二、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转变及其空间意涵

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视角出发,哈维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转变进行了批判式的剖析解读。他认为,虽然当代人的生存境遇与过去相比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仍生活在一个以生产获利为基本组织原则的社会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规

律继续在历史的-地理的发展中作为一种不变的塑造力量在起着作用”^{[7]161}。但是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由于科技与工业的迅猛发展,这种生产方式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其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资本积累战略从福特主义向灵活积累体制的转变。

“福特主义”是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最早提出的一个概念,用以描述基于美国方式的新的工业生活模式。它萌生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是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模式从粗放型向以泰勒制劳动组织和大规模生产与消费商品为特征的集约型过渡的产物。它以标准化和集中化的大规模生产为基础,极大地提高了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诱发了大规模消费。而建立在凯恩斯主义基础之上的国家干预政策和福利国家制度,通过对经济周期和有效需求的调节,维系着大规模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良性循环。1945 年以后,福特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全面确立起其统治地位,对于维持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长期稳定和繁荣起了重要作用。

在哈维看来,福特主义是一种刚性积累体制,其发挥作用主要依赖于持凯恩斯主义的国家权力、持自由主义的企业力量、有组织的劳动力三种力量的协调推动。在 1945 年到 1965 年间,三种力量基本呈现出较为均衡稳定的状态,虽然其中不免冲突的发生,但总体来说三者还是在相互抗衡角力中共同造就了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推动了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然而,从 1965 年开始到 1973 年,福特主义本身的局限性日益凸显,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循环在市场饱和、寡头垄断、投资规模过大、利润回报周期长、财政赤字等的挤压下已不复存在,资本主义发展陷入危机。哈维将这种危机发生的原因归结于“刻板”的刚性生产模式,亦即大规模生产体系内的固定投资单一刻板,缺乏弹性和预见性,就业和劳动力市场呆板僵化,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消费需求,阻碍了整个市场体系乃至资本主义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滞胀危机的背景下,新一轮的经济重建和一系列具有创造力的新奇实验及改革开始实施,一种全新的“灵活积累体制”开始出现。它绕过福特主义体制的刻板,以更加灵活的劳动过程和更快速的人才、信息、资本等的流动性,以及对各种消费需求的即时把握和刺激,使资本主义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这种灵活积累体制以地理上的分散生产、小规模生产和追求买方市场为基本特

征,往往会将资本转向第三世界劳动力低廉的地区,与福特主义的刻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哈维认为,这种从福特主义向弹性积累的转变是全面复杂深刻的,其背后对应着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转变。他指出,“资本更加灵活的流动突出了现代生活的新颖、转瞬即逝、短暂、变动不居和偶然意外,而不是在福特主义之下牢固树立起来的更为稳固的价值观”^{[7]220}。也就是说,“透过流变追求永恒真理”的现代主义相比,后现代主义更强调“异质性和差异”、“分裂和不确定性”。当然,这种后现代的“转移绝不新颖,它最新的观点肯定在历史唯物主义探究的掌握之中,甚至能够被马克思所提出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元叙事的方法理论化”^{[7]410}。因此,与大多数学者的观点不同,哈维认为,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并非是与现代主义断裂的结果,也不是整个经济社会秩序层面的根本跃迁,其本质上反映的是文化层面的调适转移,或者说是一种对作为参照物的“盛期的现代主义”的反叛。因而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是能够借由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框架加以审视剖析的。正如他指出的,“1972 年前后以来,文化实践与政治-经济实践中出现了一种剧烈的变化,……然而,在与资本主义积累的基本规律进行对照时,这些变化在表面上显得更像是转移,而不是某种全新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甚或后工业社会出现的征兆”^{[7]1}。尽管如此,这种剧烈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呢?哈维辟出了一条资本主义空间动力学的分析路径,对其中的转变机制进行了新的解读。

哈维指出,资本主义的兴起并非像其名称所指涉的那样只是资本积累和生产方式变革的结果,其崛起也是同它在世界范围内的地理活动交织在一起的,空间的扩展掠夺也是理解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维度。资本与空间会借助公路、铁路、电话等交通与通讯通信技术的革新,以及海外殖民或投资等方式,通过空间的资本化与资本的空间化,实现资本的积累与循环,进而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扩张。而在这一过程中,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资本主义会进一步开拓市场,想方设法排除空间上的各种障碍。但这种空间征服也会遭遇发展瓶颈,它会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再也赶不上资本无限积累需求的速度,在既有空间的资本承载容纳率饱和后再也无法解决积累过剩的问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资本家开始转变原有的刻板的刚性积累策略,对劳动力市场、生产过程进行

合理优化,创新产品供给与消费模式,采取“灵活积累”的方式,积极推动“全新的生产部门、提供金融服务的各种新方式、新的市场”的出现,打破了不同空间之间的壁垒,使得越来越多的资本、劳动力、商品、信息、知识等通过各种现代媒介实现了灵活的转移,从而能够避免资本积累过剩问题的发生。在灵活积累体制下,各种生产要素被灵活地整合嵌入到特定空间,资本的空间化实践得以更有效率地展开,资本无限积累与空间界限束缚之间的矛盾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

无论如何,在哈维看来,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转变主要就是一种资本积累体制的转变,而资本积累体制的转变则源于空间的有限性与资本积累的无限性追求之间的固有矛盾。也就是说,资本积累需要空间,空间是积累现实化的一个条件,也是积累状况的一种现实表现,但是空间是有限的,无限积累的要求和一定条件下的空间的有限性之间有矛盾。^[8]这种“空间的矛盾只有通过空间的创造才能够完成,比如形成铁路、公路、机场、远程运输等。生产流通和消费在某个时刻的空间上的合理化,最终或许不适应未来某个时刻资本积累的情况。空间结构的创造、重建和增长是一桩成问题而且花费昂贵的事情”^{[7]293}。即便如此,空间的创造扩张仍然是应对积累危机的重要手段,因为“谁能够影响交通运输、物质和社会基础设施方面投资在空间的分布,或者说谁能够影响管理、政治和经济力量在地域上的分布,谁就能够经常获得物质上的回报”^{[7]293},从而化解资本与空间之间的紧张关系,实现长远发展的可能。这样看来,空间创造能力也是扩大社会力量的一种重要手段,因为通过重新塑造其地理基础,社会力量被不断地生产建构出来,“换言之,重建力量关系的任何斗争,都是一种重组它们的空间基础的斗争”^{[7]297},资本主义正是在资本、空间与政治之间的转换运作中不断地发展着。而这些恰恰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中空间的秘密所在,是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关键所在,从而也是把握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转变及其危机的根源所在。

三、资本主义危机化解的时空修复策略

为了更好地展现当代资本主义历史-地理发展的基本特点,哈维利用他关于空间的社会性的洞识,借鉴列斐伏尔等人的观点,提出了“时空压缩”的概

念,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资本主义化解积累危机的时空修复策略。在他看来,时间与空间都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时间和空间的客观性在各种情况下都是由社会再生产的物质实践活动所赋予的”^{[7]255}。也就是说,社会再生产的物质实践活动的变化会影响我们体验时间和空间的主导形式。哈维指出,“资本主义的历史具有在生活步伐方面加速的特征,而同时又克服了空间上的各种障碍,以至世界有时显得是内在地朝我们崩溃了。花费在跨越空间上的时间和我们平常向我们自己表达这一事实的方式,都有利于表明我所想到的这种现象。由于空间显得收缩成了远程通信的一个‘地球村’,成了经济上和生态上相互依赖的一个‘宇宙飞船地球’……由于时间范围缩短到了现存就是全部存在的地步(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世界),所以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对付我们的空间和时间世界‘压缩’的一种势不可挡的感受”^{[7]300}。所以,在哈维那里,时空压缩这一术语“标志着那些把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品质革命化了,以至于我们被迫、有时是用相当激进的方式来改变我们将世界呈现给自己的方式的各种过程”^{[7]300}。伴随着时间维度的粉碎和空间障碍的崩溃,人类的时空观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种时空压缩的现象和体验“对政治经济实践、阶级力量的平衡以及文化和社会生活已经具有了一种使人迷惑的和破坏性的影响”^{[7]355},它使人类“对科学判断与道德判断之间的联系的信念崩溃”。这种文化与知识层面的变革深深影响着现代人的心理行为和生活方式,将人类推进到一个转瞬即逝的、不确定的世界之中,使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那么,时空压缩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哈维从资本主义处理过度积累和经济危机的“时空修复”策略中分析了时空压缩的产生机制。他认为,正是以“时间转移”和“空间转移”为主要策略的危机化解方法导致了时空压缩现象的发生。而前述资本主义积累体制从福特主义向弹性方式的转变,其实就是通过这两种策略的运用来解决资本过度积累危机的过程。其中,“时间转移是通过加快周转时间,以灵活多变、可以迅速收回投资的生产取代长期固定资本投资的生产计划,通过缩短决策时间以迎合当下不断变化的消费需求,大力开拓未来的消费市场”^[9]。而空间转移则是指通过地缘或曰地理空间的扩展来吸收过剩的资本和劳动力,开放空间生产的能力,摆脱资本积累的空间束缚,使空间变得更具流动性,更好地发挥

资本增殖的功能。正是在这种时空修复动力机制的作用之下,时空压缩的现象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在哈维看来,资本主义发展对既有的时间和空间关系加以调整、展开重建甚至是破坏性重建,是满足剩余资本追逐利益要求的必然选择。但这种重建亦即时空修复是无法彻底解决资本积累的过剩问题的,即使是弹性积累体制也只能暂时缓解或推迟过度积累危机的发生,因为时空修复的诸多策略间常常是矛盾冲突的。哈维论证道,在有限的空间地域中,资本积累的不断增长会导致资本和劳动力出现盈余。“这种盈余可能通过以下方式得到吸收:通过长期投资资本项目或社会支持(如教育和科研)来进行时间转移,以推迟资本价值在未来重新进入流通领域的时间;通过在别处开发新的市场,以新的生产能力和新的资源、社会和劳动可能性来进行空间转移。”^{[10]89}这其中包含的“时间推迟”和“地理扩张”策略虽然在短期内可能颇见成效,但从长远来看二者间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哈维通过对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紧张关系的分析就此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哈维指出,在一般情况下,基础设施可以通过固定资本投资“购买”时间,经济危机倾向可以在短期通过投资吸收当前的剩余资本和增长未来的产量和利润的方式被克服。这就是时间推迟的效用。与此同时,空间修复通过扩大市场以及持续的空间生产缓解积累过剩的问题,“全新的劳动区域分工的形成,新的和更便宜的合成资源的开发,作为资本积累动态空间的新地域的开拓,亦即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制度安排对先前社会结构的渗透,都为吸收资本盈余和劳动盈余提供了重要的途径。然而,这种地理扩张、重组和重构经常会威胁已经固定在空间中但还没有实现的价值。这一矛盾不但不可避免,而且由于新的地域实现有效运转也需要在物质性基础设施和建筑环境方面投入大量固定资本,因而将会不断重复出现……如果资本没有或不能转移,那么过度积累的资本一定会由于通货紧缩导致的衰退或萧条而直接贬值”^{[10]94-95},从而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因此,对于哈维来说,时空修复的效力总是有限的,它不可能真正化解资本主义的危机。

四、从解放的政治学走向城市权

哈维运用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方法分析了空间

与资本的逻辑关联,揭示了时空修复策略对于化解资本积累危机的权宜性。但他的理论的最终目标并未停留于此,无论是地理学的马克思主义转向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向,他的一切思考都未曾离开过“解放的政治学”,寻求改造资本主义甚至取代资本主义的经验依据和可能性构成了其学术生涯的核心旨趣。尤其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前期关于资本主义的时空动力学分析的基础之上,他将研究视域投向了全球化,以“不平衡的地理发展”作为空间政治批判的中心,结合对阶级斗争的考量,坚持“辩证的时空乌托邦”导向,克服了失望和悲观的情感,深入剖析了身体、地方、国家干预等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及其包含的解放潜能。

哈维在资本积累视域下将身体与空间运作有机结合在一起加以思考,把身体作为全球空间的积累策略的缘由,也就是说身体不仅仅是劳动力的物质载体,也是空间资本化以及资本空间化得以可能的必要条件。在这一过程中,身体不仅被自身遭遇的资本循环和积累的外部力量所塑造,同时身体实践也会反过来改变自身的生产过程、从中寻找人类的反抗与革命以获取空间正义和自由。另外,哈维在全球资本主义不平衡地理发展之中重提地方的“他性”和“差异”,将其视为与资本积累共谋又对其进行抵抗的场所,强调要“在物质上、象征上和比喻上把地方解放出来”,使得“地方”也成为其解放政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哈维也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权力与资本合谋的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积累危机的解决问题。他指出,全球化的实质就是不平衡的地理发展,这种由于资本积累危机导致的不平衡和不平等需要新的解放政治的规划加以解决,亦即“将资本循环和资本积累的逻辑从新自由主义的锁链中解放出来,沿着更具干涉主义和重新分配的路线重新部署国家权力,限制金融资本的投机力量,对寡头和垄断集团所掌握的压倒性力量进行分散化和民主化管理……重返一种更为仁慈的‘新政’帝国主义”^{[10]167-168}。这样,过度的积累就可以削弱,也有利于新的更为公正的全球经济政治格局的建立。

近年来,随着对作为资本主义空间实践结果的“不平衡的地理发展”状况的分析批判的深入,哈维将解放政治的诉求注入到他一直关注的城市空间问题的探讨中,提出了“城市权”的概念。受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任何近代城市现象都应从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中去寻找原因”的思想的启发,哈维将城市空间的生产与资本循环、阶级斗争、社会正义等联系在一起,强调正是城市化亦即城市空间化过程为资本主义运行机制提供了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的物质基础。在哈维看来,资本主义只有利用近代城市的空间形式才能实现最大限度的资本积累,而资本逻辑统治下的城市构建、空间生产必然带来不同阶级利益的不平衡,从而生产出社会的不平等。

哈维以资本的三级循环揭示了资本运动与城市空间发展的关系:第一级循环,即资本向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投入;第二级循环就是投向物质结构和基础设施;第三级循环涉及资本向科学教育和卫生福利的转移。^[11]正是在这三级循环的基础上,城市空间才得以形成和发展。资本的空间化导致了城市的产生,而城市空间的资本化则保证了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因此,城市空间的组织和运作的功效对资本家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但不容忽视的是,由于不同利益集团对城市发展和居住空间的要求不同,各方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卷入人为环境的创造、管理和利用的不同领域的斗争。因此,城市的发展过程在很大意义上也就成为不同利益集团或阶级之间为了争夺空间的所有权与使用权,而不断对空间安排进行讨价还价乃至冲突的过程。于是,空间的占有、支配、控制和创造便成为不同阶级之间协商抗争的重要议题,这其中深刻地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不平等。而要实现城市乃至整个社会的解放,就需要激发人的权利意识,通过对既有城市秩序的反叛以及对空间生产的抵抗,争取城市生活的生产者和再生产者的城市权利。

关于“城市权”,列斐伏尔认为是到城市居住并获得适当的生活条件的权利,是在城市中形成的一种需要和呐喊。而苏贾认为城市权是基于空间意义上的人权,是一种对城市公共空间的占有和使用的权利。哈维受列斐伏尔和苏贾的观点的启发,从城市权的起源、人权属性以及追求目标等角度发展了城市权思想。他指出城市权源于社会实践,属于全部城市生活的生产者和再生产者能够合理地使用并享受城市生活的复杂权利。他还强调,“城市权不仅仅是个体或者群体获得城市资源的权利,它还是我们心中愿望的改变和重新建造的权利。它更多是集体的而不是个体的权利,因此,重建城市难免依靠在城市化进程中集体力量的作用”^[12]。另外,在哈维的眼中,

城市权也并非实体化的名词,而是革命性的动词。因此,他所谓的城市权更多的是一种“民主性的建设”,而非像现代以来的城市化进程那样,完全是在资本管控之下的一种“创造性的破坏”。所以,对城市权的追求实质就是对资本积累进行民主控制和管理,以确保实现城市生活的公平正义。哈维认为,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通过争取城市权实现城市空间的平等正义是反抗全球资本主义的根本选择路径之一。

五、启示与反思

哈维通过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升级”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激活了以马克思为中轴的整个辩证法传统的积极意义。他运用时空压缩、时空修复等概念,围绕空间与资本的关系衍变对资本主义的当代发展状况进行了诊断,并结合城市空间实践的研究,分析了不平衡的地理发展的必然性及其后果。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一些反抗全球资本主义的思路和策略,为我们理解资本主义危机开掘出一条极富启发意义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路径。这种分析路径不仅为社会学“冲突论”的发展打开了崭新的运思空间,也赋予“社会学想象力”以更丰富的空间想象力,在马克思、社会学、地理学、新马克思主义之间架设起沟通的桥梁,为把脉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分析论据。

尽管国内外不同学者都注意到了当代社会学理论发展中的空间转向,比如特纳主编的《Blackwell 社会理论指南》中专门有一章介绍了“关于时间与空间的社会学”^{[13]504-535},国内学者文军^{[14]360-379}、何雪峰^[15]、潘泽泉^[16]、郑震^[17]等也对社会学的空间转向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这些论述或者只是某种宏大理论的补充“点缀”,或者仅仅聚焦于空间转向发生的背景、原因、意义及其发展脉络等,更多地着眼于必要性或必然性的抽象分析,至于“空间与社会究竟是如何关联在一起的”似乎并没有像默顿提倡的那种“中层理论”层面的具体而富逻辑连贯性的分析,至于其对“社会学想象力”的激发作用也往往停留于“想象”的阶段。而哈维的后现代性新马克思主义则将这种“想象”借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通道落实到对资本主义社会与空间的具体认识轨道上,在一定程度上践行了米尔斯提出的发挥社会学想象力要“从不止一个学科中选取材料、概念和方法”^[18]的思想,从而为从空间视角出发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提供了有益的参

考。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哈维“在社会理论之中以空间为立足点对元理论的推动”,以及“对全球层次日益加速的资本积累及其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强烈理论干预”^{[18]535},无论是对于西方还是中国的社会学界都有独特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 C. W. Mills.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 [2] [美]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M].谢立中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 [3] Noel Castree. David Harvey : Marxism , Capitalism and the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New Political Economy*. 2007.No.2.
- [4] D. Harve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M]. Oxford : Blackwell. 1988.
- [5] [美]大卫·哈维.资本的空间:批判地理学刍论[M].王志宏,王玥民.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10:Pre.vii.
- [6] D. Harvey. On the history and present condition of geography : A historical materialist manifesto.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1984. Vol.36 , No.1. Pp.1-11.
- [7] [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M].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 [8] 强乃社.资本主义的空间矛盾及其解决——大卫·哈维的空间哲学及其理论动向[J].学习与探索,2012(12).
- [9] 牛俊伟,刘怀玉.论吉登斯、哈维、卡斯特对现代社会的时空诊断[J].山东社会科学,2012(3).
- [10] [美]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M].初定忠,沈晓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 [11] 何雪松.新城市社会学的空间转向[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
- [12] David Harvey. *Rebel City : From the Right to the City to the Urban Revolution* [M]. London : Verso. 2012.
- [13] [英]布赖恩·特纳.Blackwell 社会理论指南[M].李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 [14] 文军.西方社会学理论:经典传统与当代转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 [15] 何雪峰.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J].社会,2006(2).
- [16] 潘泽泉.当代社会学理论的社会空间转向[J].江苏社会科学,2009(1).
- [17] 郑震.空间:一个社会学的概念[J].社会学研究,2010(5).
- [18] [美]戴维·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J].胡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 顾理辉

Spatial Extension of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Harvey's Theory of Post-modern New Marxism and its Enlightenment

LIU Cui-xia

(School of Management,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226019, China)

Abstract: Harvey's theory of post-modern new Marxism integrates the space category of geology into Marxism, analyses the present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with the help of the theory of time-space compression and spatial fix, and discusses the inevitability and consequences of unbalanced development. He added a new spatial link outside the conflicts between sociology and Marxism, and connected sociology and geology, which has extended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of Mills and has extended it from a diachronic perspective to the neglected space.

Key words: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spatial turning; new Marxism; Harvey